



莲华生大师的生平  
及其学说渊源略考

郭元兴

1986年6月20日

中国佛学院

## 莲华生大师在大乘佛教

### 发展史中的地位

自大乘佛教于释迦牟尼入灭后第二五百年中（公元一世纪）开始流行以来，印度、中国和日本都出现了许多名垂不朽的大师。印度有显教的六庄严和密乘的八十四大成就者（84 Siddhas）。中国（包括西藏）和日本有各代的著名译师和创宗宏法的各宗祖师以及传灯大师。他们的学行和修证的功德事业都为后世所景仰，受到信徒的崇敬。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从未有人将这些法门龙象和教主释迦牟尼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号称为八宗之祖的龙树（naga juna）也只被认为是初地菩萨。但是，公元八世纪中到西藏建立佛教的莲华生大师却在佛教史中第一个赢得“第二佛”（Sans-rgyas gñis-pa）的尊号，而且他在信徒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过阎浮提（gamludvipa）的教主。虽说在西藏后宏期佛教中（公元978年开始）也有几位大师被推尊为“第二胜者”（Rgyal-la gñis-pa），公元一二〇四年入藏的释迦吉祥贤（Sakyasrihadra 1127-1225）在迦湿弥罗（Kasmira）也享有“第二胜者”的声誉，但在影响上似乎都不能和莲华生相比。近代意大利著名东方学者图奇（G. Tucci）曾称赞莲华生是一个 Dig-Vijaya（世界征服者）。的确，征服人类的心灵并受到人们世代的崇敬是自有人类以来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大宗教的教主和

最伟大的思想家才办得到，莲华生无疑是其中的一人。

和历史上古代伟大人物一样，莲华生的生平也存在许多史实问题。异说纷纭，从来没有论定。西藏佛教后宏期的各家历史著作对于前宏期的史事有关莲华生的只有他入藏后建立桑耶寺等一些活动。公元一三五二年乌长洲 (n-rgyan-ling-pa) 发掘出《莲华遗教》(Pad-ma lkanthan) 一书，才有一部比较详细的莲华生的传记。公元一六一〇年多罗那他 (Taranatha 1575-1633) 写出《大阿闍黎莲华生传·三信具足》一书以印度的传说为主(另外在他的《七系付法传》和《印度佛教史》中也多次述及莲华生的学系和行事)。以上两部传记，前者书末记载著者为莲华生的女弟子智慧海王 (ye-ces mtrho-rgyal) 于八十五岁时(829) 著，故称为藏派传承。后者其史料来源于印度，故称为印派传承。两书对于莲华生在印、藏两地的事迹互有详略，本来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两者主要分歧之点在于前者叙述了莲华生在释迦牟尼入灭后不久(6年、8年或12年)即降生(莲华中化生)的故事，后者则明确记述莲华生在印度提婆波罗王 (Deva Pala) 在位时期降生为乌长 (Qddiyana) 王族悉哩伽歌罗 (Srigadhara) 之子，因而形成无法统一的矛盾。其实，前书的全名为《上师莲华生本生传》(guru padma hlyün-gnas-kyi skyes-rai sRnam-thar)。我们知道，“本生”(梵: gataka) 指

以往多生的行业因缘，如果作为现生事迹来理解显然是不恰当的。在前书中莲华生入藏后的事迹记述特别详细，其中有些记事可以解决赤松德赞时期的历史疑难问题，非常有价值。而在后书中多氏所记莲华生在印的修学事迹大多可以和当时的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相印证。因此，我们可以把前书中一部分记事依其书名作为莲华生的“本生”（T.b. Skyes-rals; Skt. jātaka）行迹，而把两书中可以统一或互相补充的部分联系起来对这位大师进行一些历史的考察。作为历史人物，本文想对他的生地、生年以及他在唐代中国大乘佛教兴起的创宗思潮中所起的作用作一些考察。这个思潮同时也在日本产生极大的影响导致佛教名宗的形成以至真言宗的创立。这一思潮大大地突破了印度原来空有两个学派的格局，使大乘佛教学说的发展达到其历史的顶峰。在下文中，我们简称前书为《本生传》，后书为《三信传》。

### 莲华生大师的生地

关于莲华生的出生地，两传都记载为 u - rgyan。其梵名为 uḍḍiyana 或 Qḍḍiyana。其地望在本世纪初西方及印度的学者有的主张应位于东印度孟加拉一带，但自意大利学者图奇（G. Tucci）和德国学者霍夫曼（H. Hobbmanr）于本世纪中叶发表了有关西藏迦举派乌金巴宝吉祥（u-rgyan-pa Rin-chen-

Olpal 1230—1309), 多罗那他之师印度佛驮笈多 ( Buddha-gnpta 约十六世纪下半在世) 和拉达克僧人乌金巴语自在海 ( Q-rgyan-pa nag-dban-rgya-mtsho, 又名 Stag-tshan-ras-pa ) 三人亲赴 u-rgyan 的行程游记的研究论文后, 这个问题已完全澄清了。这个地方就是法显《佛国记》中的乌苾和宿呵多, 玄奘《西域记》中的乌仗那国。这一勘定也使我们知道, 过去把这一地名还原为梵语的 udyana ( 苑囿 ) 是不对的, 它的原名应当是梵文典籍中屡见不鲜的 Q(u) ddiyana。这是秘密佛教 ( Esoteric Buddhism ) 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事实上也是最重要的发源地。在印度后期密乘中声名显赫的因陀罗部底王 ( Indra-bhita ) 就是此国的国王。

这个地区可以说自古即以咒术著名。这里我们不妨引录几条中国古代的记载。

1. 《艺文类聚》卷九十六引《抱朴子》佚文云, “案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 ……” 下文述外国方士能以神咒咒龙求雨之事。《抱朴子》即葛洪 ( 283—363 ) 所著书。文中甘宗, 当即班超于公元九七年派遣西行之使者甘英。这件事与宋云的行记联系起来看 ( 见下 )。 “西域” 显然是指乌苾。

2. 在梁《高僧传》中名列神异之首的佛图澄 ( 232—348 ) 于公元三一〇年来华后所显示的咒术神通, 较之印度后来的八十四

大成就者(84 Siddhas)可以说毫无逊色。《魏书·释老志》说他少于乌 国就罗汉入道,《高僧传》卷九说他“白云,再到罽宾,受海明师。”事实上,当时罽宾一名也就是指乌 地区(见下文)。

3. 公元五一八——五二二年奉命西使的宋云于其《行记》中记载汉益陀王舍位与子,“向乌场国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尽得其术。”后又回国咒服山池毒龙的故事。

4. 成书于公元五四七年间的杨 之《洛阳伽蓝记》卷四记法云寺的乌场国沙门昙摩罗“学穷释氏”,“戒行清苦”,“秘咒神验,阎浮所无,咒枯树能生枝叶,咒人变为驴马,见之(者)莫不惊怖。”

5. 成书于公元六四六年的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述及乌仗那国的情况时,说其地之人“禁咒为艺业”,“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僧徒则“戒行清洁,特闲(娴)禁咒。”

上引资料说明乌 一地自古即以咒术驰名,公元七世纪以后印度秘密佛教盛行,各种流派都以乌 作为其发源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个地区在汉文史料中往往又以其他名称出现,近代史学者往往对于佛教典籍的记载不甚熟悉或不能全面掌握,故对中亚地区某些地名的勘定往往不能做出恰当的结论。例如罽宾一名,有人认为

是指玄奘《西域记》中之迦毕试 (Kapisi)，有人认为应指《西域记》中之迦湿弥罗 (Kasmira)。事实上，阿姆河以南，以乌苾为中心南抵健陀罗，那揭罗喝，东西包括上述迦毕试和迦湿弥罗两地的广大地区，都可以称为属宾。如《西域记》卷三乌仗那国的阿波逻罗龙泉，在《善见律》卷二中即以此龙在属宾。《说一切有部杂事》卷四所说健陀罗药叉半支迦 (Pancika)，《大孔雀明王经》则以此药叉住属宾国。《汉书·西域传》说属宾国治循鲜城。此城即《西域记》卷三健驮罗国之旧都布色羯逻伐底城 (Puskalavati, Susen)。故唐朝于公元六四八年设立修鲜 (≈循鲜) 都督府，领十州 (705年增为11州) 统辖以上地区，肅属安西大都护。公元七四五年唐玄宗册封其地之王子袭属宾及乌苾国王。由此可见，属宾与乌苾可能在地区范围上在不同时期略有广狭之异但在汉晋六朝时期基本上是统一的。此一时期的汉文佛典中所说的属宾应该都是指乌苾而言。如佛图澄在《高僧传》中说他“再到属宾，受诲明师。”《释老志》则说他“少于乌苾国入道。”

这一地区在佛教典籍中也称为“月氏国”，如上举乌仗那国的阿波逻罗龙池和《西域记》卷二那揭罗曷国的瞿波罗龙 (Gopala) 佛影窟，《智度论》均以为在月氏国。《高僧传·慧远传》亦以后一佛影窟在月氏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在佛教经典中又常称之为 Cina。

如《大孔雀经》中药叉名录一段所述住于 atavi 之 atavako 药叉，住于 Bahudhanyaka 或 Varnu 之药叉 Kapila，住于 Brahmevati 之 Mani-bhadra 药叉，住于 Kasmirasamdhi 之 Panika 药叉，在《月藏经》五十五中都称其住于 Cina。另外，《孔雀经》中住于 Tukhara (吐火罗) 的 Jinarsabha 药叉，在《月藏经》二十九中 Jiarsabha 则住于 Suvarnagotra (金矿国、金氏国)。以上情况法国烈维 (Sylvain Levi) 首先发现 (见冯承钧译烈维著《大孔雀经药叉名录与地考》，1931 版)。Suvarnagotra 即《西域记》卷四之苏伐刺拏瞿咄罗国，《新唐书·西域传》称为东女国，其地在汉文史料中亦称大羊同国五十年代中叶意大利学者图奇 (G. Tucci) 亲赴尼泊尔考察发现不少第一手资料，证明其他之异名有 Striajya (女王国)，Zaṅ-zuṅ (Shan-shun 羊同，象雄)，Suvarṇabhūmi (金地)，Cinabhūmī (支那地) 等。(见 Tucci 著 Preliminary Report of Two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Nepal, § 12, pp 92-105)。关于这个女国的幅员大小，近代学者习于地图上小国国的观念，将其缩小为吐蕃西南部的一小片地区。这种做法往往会导导致古代记载中的矛盾而无法解决。如上文中的厨宾即是一例。据本教 (Bon-po) 的《瞻部洲境释》(Hdsam-glin-yul bshad) 一书所说，Shan-Shun 可



分为里、中、外三部。中部在冈底斯山 (gans-t-se 即 Kai-lasa) 西一日程之外。外部之东北达上安多 (Mdo-stod) 地区今青海省海南和果洛两藏族自治州一带。里部在冈底斯山西 (实为西北) 三个月程之外的 par-zig, Bha-dag-shan 和 Bha-lag 一带。最后几个地名近代的藏学家不能确指, 有人认为 Par-zig 为伊朗之古波斯国, 大误。我们从汉文的西域史地资料不难推定, 所谓三个月程, 大约为五千里左右。据《新唐书·西域传》女国在朱驹之南三千里, 正当 Shan-shun 之中部。据《魏书·西域传》由莎车西行经伽倍, 折薛莫孙, 钳敦以至弗敌沙 (Badakshan) 为 2060 里, 又由弗敌沙西至薄罗城 (Balkh) 为 2100 里。因此我们可以立即比定 Bha-lag 即《西域记》卷一之缚喝国, 梵语之 Bahlika, Bahlaka, 古之大夏及大月氏之都城, 后人亦名为 Bactria, Bha-dag-shan 显然是《西域记》卷十二之钵钵创那国, 今之 Badakhshan 地方。至于 Par-zig 当为宋云行记中之波斯, 《书》中之波知, 其地当在摩罗与商弥之间, 或即《西域记》之屈浪国地, 及乌仗那之阿波逻罗龙泉邻近区域。这就是说, 玄奘《西域记》中所说的货逻国故地的大部, 也可纳入 Shan-shun 的范围。这就无怪《孔雀经》中住于 Tukhara 的 jinarsabha, 在《月藏经》二十九中则以其住于 suvarna-gotra 了。

以上各种史料说明，以乌菴为中心的周围广大地区，至晚在《大集经》编订的时期又都可称为 Cina-bhumi (支那地)。

《大集经》虽在五世纪初始由昙无讣译出大本，但公元三世纪中开始译经的竺法护 (231—308) 已译出其一部分。故可推定《大集经》之编订在其前一世纪中，即公元二世纪中叶，其时正当贵霜月氏王迦腻色迦逝世后。当然，经文上引用的地名应在世间久已约定俗成之后，这就是说，上述诸地之可以被称为 Cina 更应早于二世纪中叶，即应再上推一个历史时期，约当西方史家所说的贵霜帝国成立的初期，也就是班超西使的时期 (73—102)。

我们要注意，所谓贵霜帝国，唃哒帝国，帖木儿帝国等“帝国”的称号都是近代西方史家用西方的国家概念所附加，当时他们并未以此自称，尤其是他们在对待中国的关系上更未以此自居。如大月氏在班超时已是中亚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他的五部翊侯 (包括贵霜) 仍然“共禀汉使者”，即接受汉使的号令，故班超征发的西域兵中就有月氏兵。唃哒当宋云西使时 (518—522) 最为强盛征服四十余国，但接见魏使时仍行藩属之礼，“再拜跪受诏书”。帖木儿的强盛也不亚于大月氏和唃哒，但对明朝仍行藩属进贡之礼。其所以如此，原因本来很简单。因为他们虽然立国异域，但他们的祖先都来自中国，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有把自己抬高和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想法。近代学者硬把现在的各国之间一律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

套用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不符合古代历史实际的。

我们知道大月氏和塞种原住敦煌至祁连山一带，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受匈奴之逼西迁中亚，“大月氏西击大夏而臣之，而塞王南君属宾”。大月氏有人谓即禹氏、虞氏，这在字音上是可以相通的。有虞氏为黄帝之后。塞种则前人考为《左传》上的允姓之戎，瓜州（即敦煌）之戎和姜戎氏，故为炎帝之后。所以这两族也是炎黄的子孙，在公元二〇〇〇年前因氏族分化而西迁瓜州。但由公元前五五九年戎子驹支（属塞种）对晋卿范宣子的答辩（《左传·襄公14年》）之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华夏（炎黄）传统文化的掌握还是有很高的水平的。正像近代流寓世界各国的华侨一样，虽然传世十数代数百年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和对祖国的怀念与崇敬。蒙古土尔扈特部西迁俄国五百余年仍然不失民族本色于一七七一年历尽艰险返回祖国。现代如美国华人聚居之地仍然叫做唐人街，华人街。这里请读者注意，地名取了华人或唐人的名字绝不意味中国的政权可以行使到这些地方。因此，大月氏和塞种在建国中亚后名他们所占据之地为Cina 看来也是很自然的。这是上述属于大月氏或属宾的地区在佛教经典中又称为Cina 的唯一可能的原因。至于Cina 一名的起源，近人多以为“秦”的对音，作者认为这种比附只注意到表面现象，其实际内涵要深刻得多，这个问题拟另文详

论，此处不能多谈。但这里不妨姑举一例。玄奘《西域记》缚喝国的旧王伽蓝，在慧超《往五天竺传》(724—727)中名为沙系(Sahiya ≈ Sakiya ≈ 'Sākya)寺，在悟空的《行记》中名为迦腻吒王演提丽寺，但《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六六六年编的《西域志》(或王玄策作)文名此寺为汉寺。由此可见，沙系(或沙系耶)、迦腻吒、和“汉”(cina)在意义上是可以通用的。这位大月氏贵霜族名王在玄奘《西域记》上才开始使用Kaniska的名称，其前之西晋译《阿育王经》，其后之悟空行记却称之为Kaniṣṭha。这个名称近代学者把它作为专名进行考索一直没有确定的结果。作者认为这是一场误会。事实上，这是一个称号，所以使用者不止一人。据藏传的史料，公元四五两世纪间就可能有两个Kanik王。这个名字显然和塞迦纪元(Sakābda)有联系。塞伽纪元开始于公元七八年，即班超至西域后第六年。当时月氏王可能通过班超与汉朝庭发生联系或接受一定封号。如在班勇时(126)就受封为后部亲汉侯。这就是说，月氏王因为其政权得到大汉的承认所以建元(塞迦纪元)立尊号(Kaniṣṭha)以示荣耀和纪念。因为大汉是祖国，因此自称为罽泥吒，kan + iṣṭha，即“小汉”、“幼汉”的意思(The youngest kan<汉>)。

其人应即班勇所记的阎膏珍，他可能和他的父亲一样也享有八十  
余岁以上的高龄，在班勇回朝后去世，在位时间至少为78—130  
130凡53年，也可能为61—130凡70年。我们看清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南越王赵佗在位七十余年，  
把阎膏珍在位期定为53—70年也无不合情理之处。

关于大月氏与塞种的关系本文也不能详细讨论，我们当前只要以上例中确定自公元一世纪起大月氏王可以塞种（塞种纪元 'Sakabha）释种（沙系，沙系耶 sāhi, ' sāhiya = sākiya ≈ 'Sakya < 'Saka），或“汉”（Cīna）自称就可以说明一些历史现象了。公元十一世纪初阿拉伯学者 al-Biruni (973-1048) 曾见到在 nagarkot (即那揭罗曷 nagarahāra) 一古堡中发现的丝娟上写有 Shāhiya 王家六十余代的系谱，其中有建造 Kanik-Chaitya (雀离大塔) 的 Kanik 王。又呾哒王在《魏书》中称为大月氏，此呾哒显然即玄奘《西域记》卷十二的唃廝囉王 (Himatāla 雪山下，或 Hematula 金山下)，但玄奘谓其“王，释种 ('sākya) 也”。又近代在 gilgit 发现的古经卷抄本尾页上有 'sāhi 族的王名，学者研究谓与 Kalhana 所述之 Darada 'sāhis 有关，Tucci 谓 gilgit 即藏文中之 Bru'sa，其王室与 Qddiyāna (Suat) 诸王似有某些关系 (Some Connection)。 (见 Tucci: Minor Buddhist Tents, Part I, PP 179-182)。事实上，玄奘《西域记》曾指出达丽罗川 (Darada) 为乌仗那的旧都，故两地的统治世家当然应为同族。玄奘《西域记》卷三特别叙述乌仗那国王源于释种的故事。故事情节虽与历史实际不符，但于证明 'Sahi 与释种 ('Sakya) 的同一还是有意义的。

关于释种 ( 'Sākya ) 和塞种 ( 'Saka ) 的关系问题,从字源说, 'Sākya 为复合字,由字根 'Saka 加“彼益”( Taddhita ) 字尾 ya 构成, ya 表“源于‘或’后裔”( descended from , born of the race of ) 之义。两者复合时,字根第一音节取增音变化 ( Vriddhi ), 尾音脱落。故得

'Saka+ya → 'Sākca ) + ya → 'Sākya

'Saka 为塞种,故 'Sākya 之义即“塞种之裔”( 'Sakā abhijano ya = descended from 'Sakas )。塞种之裔当然就是塞种,和孔子为孔氏之子即孔姓一样。把塞种和释种二者等同的人历来以为是梁武帝时的荀济,由于他是一个激烈反佛的人,所以他的这个说法受到中国僧徒的驳斥,认为是对释种的诬蔑。作者认为,这是当时华夷尊卑三分的一种民族偏见。上文已指出瓜州允姓之戎(姜戎氏)也是炎黄之裔神明之胄,何轻贱之有?荀济上书梁武帝在公元五二七年梁朝建同泰寺时,其后颜师古(581—645)注《汉书》仍持释、塞同种之说,可见此事在古代学术界是无异议的。而且,颜师古为之推之孙,家世有信仰佛教的传统,他本人又是当时极精博的学者,绝不会以无据之言来贬抑佛陀的种姓。事实上,竺法护于二八八年译《密迹金刚力士经》(收入707—713年译出之《大宝积经》,为第三会),其中提到的释种和月支,与藏译本对勘,即 'Saka(塞种)和 Tho-gar(吐火罗)。

法护为精通西域36种语言的月支族大译师，他翻译和自己种族有关的专名其正确性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以上的讨论是为了说明莲华生出身的乌菟王族（释种）应是公元前二世纪中自中国敦煌（瓜州）西迁至中亚而又“南君罽宾”的塞种的后裔。历史上各民族无不重自己始祖的来源，世代相传，不会忘失。如汉末来华的安世高，其后裔在唐朝仍相传其安息的王室为中国黄帝之子“安”的后人。元魏拓跋氏亦相传为黄帝的后人。这些传说历来史家多不予置信，弃舍不道。作者认为，司马迁把有关黄帝的不雅训的百家之言或搢绅先生难言之事弃置不录是古史的一大劫难，其性质与秦火无异。现在人们逐渐清楚，恰恰在那些难言的不雅资料中包含最货真价实的原始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准确记录《山海经》和屈原《天问》中所展现的历史画卷和地理图景不是比《禹贡》和《五帝本纪》更符合初民社会的实际吗？

上文明确了莲华生出身的乌菟王家来源于中国瓜州的塞种大月氏，即炎黄两族的分化支派姜戎氏（允姓之戎）及有虞氏（禹氏）。这个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索，非本文所能详。其次乌菟王族和中国的政治关系自张骞西使至大夏时（公元前128年）至公元六五七年唐朝于西域分置府州凡七八五年间往来关系史不绝书。重要的如汉宣帝和元帝时期（公元前73—33）年汉朝立阴末赴为罽宾王。公元五一九年宋云入乌场时，乌场王行藩属之礼，“膜拜受



诏书”，并对魏胡太后“面东合掌，遥心顶礼”，并说中国“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此王也就是五五六年至邺的乌场国僧那连提黎耶舍约于公元五三〇年左右回乌苻时所见之“与佛同姓，亦姓释迦”之乌场王，耶舍称赞他“真大士 (mahāsattoa) 也”。我们从多罗那他的《七系付法传》所述各派密法的传承顺序和时代很容易推定密乘中非常显赫的 Indrabhūti 也非此王莫属。实际上，若将这一时的罽宾（即乌苻）来华的译师、高僧等总合起来考察，可以看出两地文化的联系一直延续未断。其中王族高僧来华者就有数人，如三一〇年至洛阳的罽宾王元子佛图澄（近人从赵明诚《金石录》之说以“罽宾”为“附庸”二字之讹，大误。印度当时并无统一王朝，何来附庸小国。而且，当时的郭璞（274—322）在《山海经注》中说，天竺国为月支国的附庸，罽宾乌苻为月支的根据地何能反为天竺的附庸），四三一年至扬州的罽宾王子求那跋摩，五四一年于邺都译经乌苻王种释迦之苗裔毘目智仙。

公元六五七年唐于罽宾乌苻置修鲜都督府，领州十，统于安西大都护。由其州名看，可知其东面包括波路、悬度，北面包括乌苻北部之阿波逻罗龙泉，南面包括健驮罗国之檀特山，西面包括活国 (Warwāliz, 遏挨城 aw ar)。这正是我们在上文所考察的以乌苻为中心的“塞王南看罽宾”的地区，其取名“修鲜”当然是源于《汉书》中罽宾的都城“循鲜”。这一地区也是佛经梵典中屡见不